

## 北朝《華嚴經》寫經與刻經初步考察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崔中慧

### 摘 要

北魏時期華嚴思想的流行受到北魏宣武帝支持與幾位高僧的大力弘揚有關，主要包括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曇無最等。菩提流支弘揚佛學思想中的涅槃與華嚴義學，同時他對淨土思想亦影響深遠；勒那摩提擅長《華嚴經》與《十地經論》；曇無最擅長宣講《涅槃》與《華嚴》。這三位僧人於初期華嚴思想的弘揚奠基有重要的貢獻，對北魏佛教有深遠影響。北魏之後，東魏北齊佛教重心從洛陽轉移至鄴城，興起佛教史上規模最大的刻經活動，範圍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等多處山崖出現的石窟與摩崖鑄刻佛經。本文考察北齊鄴城相關的石窟與刻經地點，發現多處均鑄刻《華嚴經》或與華嚴思想有關的刻經，反映華嚴在當時所受重視的程度。例如河北涉縣中皇山、響堂山、河南安陽小南海石窟、安陽寶山靈泉寺石窟等。其中尤其以南響堂山一號窟專門鑄刻《華嚴經》而稱為華嚴洞；另，中皇山石窟集中鑄刻《華嚴經》、《十地經論》、《大般涅槃經》與《深密解脫經》，顯示華嚴、十地、涅槃思想在鄴城佛教的重要性。本文藉著《華嚴經》在不同地域流行，由寫本與刻經之間書法風格，探討早期佛經在南北地域間移動的文化交流現象。

**關鍵詞：**佛教刻經、北朝、《華嚴經》、鄴城佛教、中皇山

## 前言

中國初期佛經翻譯高僧在不同譯場翻譯以後經典是如何在區域之間流通的？例如現在一般通稱「晉譯華嚴」是 418-420 年在南方健康道場寺所翻譯出的，此經從南方建康道場寺譯出後，逐漸由南向北傳布。於南北朝時佛教有六個主要的中心，以長安、建康、嵩洛、鄴城、荊州、廬山與南海。北朝之洛陽與鄴城是二大主要佛經翻譯中心，而北魏於 534 年分裂為東西魏，隨著元魏洛陽政權的解體，東魏與北齊的佛教中心也由洛陽轉移到鄴城。<sup>1</sup>北齊（550—577 年）朝代雖短，僅歷六帝共 28 年，但是佛教在這時期卻得到空前的發展。高洋在位時期（550—560 年），北齊國力達到鼎盛。疆域擴及今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內蒙古一部及蘇北、皖北的廣大平原地區，是北齊國力鼎盛的時期。<sup>2</sup>高歡遷都鄴城，洛陽地區諸寺僧尼曾相率來到這裏。除了在鄴城興起地論與華嚴學的研究，鄴城與鄰近北方出現佛教石窟與造像藝術的巔峰，還出現大規模的石刻佛經。這種看似突然興起的刻經文化現象活動，實際上是從前朝的佛經書寫流通逐步發展演進所累積的，以下將先從南北朝史料中所記載關於《華嚴經》的書寫流通，進一步再考察北齊的石窟刻經，由比較分析當時刻經規模最大的中皇山刻經書法風格，說明北齊與南朝之間密切文化交流的現象。

### 一·南朝書寫《華嚴經》史料

關於《華嚴經》向北流傳的關鍵，根據魏道儒指出，主要是南朝劉宋時期的劉義宣：「劉宋時期支持弘揚《華嚴經》的重要人物是劉義宣。他曾師事譯經名僧求那跋陀羅（394—468 年），446 年出鎮荊州時，攜其同行。劉義宣鼓勵求那跋陀羅宣講《華嚴》，使該經傳播到京城以外地區。」<sup>3</sup>除了宣講弘法，《華嚴經》流傳主要有賴書寫複本流通。南朝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79—502 年）曾抄經 17 部共計 259 卷，根據《歷代三寶紀》卷 11 記載：「右子注及抄經合一十七部凡二百五十九卷，並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愛好博尋躬自緝撰，備忘擬歷不謂傳

<sup>1</sup> 李四龍，〈經典、地域與思想傳統—以六世紀地論史與北方佛教中心為例〉，《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1，頁 83。

<sup>2</sup> 丁明夷釋譯，〈趙郡王高叡修寺碑〉，《佛教新出碑志集粹》，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4。

<sup>3</sup>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世界宗教研究》，1999 年 1 月，頁 68。

行，後代學人相踵抄讀。」<sup>4</sup>蕭子良於永明八年（490年）還參與抄寫《華嚴經》，根據《華嚴經傳記》卷1記載：

「鈔華嚴經一十五卷，右昔南齊司徒，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者，天機秀發，宅心真境，望億劫而長驅，凌千歲而獨上。若闡揚經教，開弘福業，莫不出自神裏行之身命。永明八年，感夢東方天王如來，冥資聖授始撰淨住之法。又夢沙門自稱智勝，引對佛前，教其轉讀，因傳經唄之則。又擢率朝賢，啟龍華三會之福，祇勸士庶，受菩薩三聚之戒。竝祥瑞鬱蒸，難得而言者也。加以閱彼龍宮，忉斯象跡。毘贊玄化，住持覺運。凡鈔如上等諸經，三百餘卷。撰弘益文翰，一百餘卷。自手書經七十餘卷，其所撰內有華嚴瓔珞經二卷，標出世之術，華嚴齊（應為「齋」）記一卷，敘法會之致，竝可以垂鏡來葉，不刊之勝蹟」<sup>5</sup>

## 二·北朝《華嚴經》與《十地經論》

在敦煌出土的佛經寫卷中，北魏宣武帝時期有一批敦煌官經生所造的《華嚴經》，當時有三個關鍵人物在抄寫流通弘揚《華嚴經》重要角色，北魏宣武帝朝宮廷大將安豐王元延明（484—530年）與侍中崔光（451—523年），<sup>6</sup>以及北魏洛州刺史馮晉國（約活躍於479年），馮晉國即馮熙，《魏書·馮熙傳》記載：「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sup>7</sup>而根據敦煌藏經洞出土紀年479年《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卷尾記載一段非常重要的題記：

「雜阿毗曇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說。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懼昏流迷於廣文，乃略微以現約，瞻四有之局見，通三界之差別。以識同至味，名曰《毗曇》。是以使持節、侍中、駙馬都尉、羽真、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車騎

<sup>4</sup>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大正藏》冊49，卷11，頁96中28-下3。

<sup>5</sup>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51，卷1，頁156上27-中12。

<sup>6</sup>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51，卷5，頁170下20-24；另見《辯正論》《大正藏》冊52，卷4，頁514下23-28。「魏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竝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素書金字華嚴一部。皆五香廚，四寶函盛。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色神光，照耀臺宇，眾皆共觀，倍更發心。」

<sup>7</sup>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1818。

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啟府洛州刺史昌黎王馮晉國，仰感恩遇，撰寫十「一切經」，一一經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願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闡以熙寧，協淳氣而養壽。」

《雜阿毗曇心經·卷第六》是洛州刺史馮晉國所寫經，根據卷尾的題記，<sup>8</sup>可知馮晉國虔心供養佛經，為皇室祈福。他還以自己的家財在各地州鎮建立 72 處佛圖精舍，根據《魏書·馮熙傳》記載：「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sup>9</sup>馮晉國以個人資財能夠「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建立 72 處，同時還抄寫了 16 部「一切經」，這是很值得重視的。<sup>10</sup>據《華嚴經傳記》、《辯正論》所載，<sup>11</sup>元延明博學有文才，負責掌管國家金石碑碣事務，他與元熙（西元 515 年卒）是宣武帝時的大將，也都是虔誠護持佛法的佛弟子，二人不但建立道場開齋講經法會，亦曾供養以香汁研墨所書寫的《華嚴經》一百部，以及金字書寫於素絹的《華嚴經》一部。這是晉譯《華嚴經》自從南方翻譯出來八、九十年之後，向北方流傳，文獻記載抄寫《華嚴經》部數最多的一次記錄。

通過元延明與馮晉國這一層家族與信佛的關係，可以推測，元延明負責掌管國家金石碑碣事務，有可能以其在朝的職務，對北魏宮廷收藏佛經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顯示北魏時期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來抄造佛經「一切經」，<sup>12</sup>此後不久，北魏敦煌東陽王元榮也有供養與造經的活動，開始進行「一切經」的抄寫流通，是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具影響力的關鍵。<sup>13</sup>

北魏宣武帝於西元 508 年邀請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伏陀扇多在洛陽合作譯出

<sup>8</sup> 崔中慧，〈敦煌藏經洞出土北魏《華嚴經》寫本研究〉，2016 年華嚴學術會議論文。

<sup>9</sup>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1818。

<sup>10</sup>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 2：「魏元氏太祖道武帝（371 年—409 年），於虞地造十五級塔，又造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經，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大正藏》冊 51，卷 2，頁 974 中 14-15。

<sup>11</sup>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70 下 15-16。

<sup>12</sup> 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敦煌寫本佛經可大別為：一切經、供養經、日常用經等三大類，其中一切經乃官方寫經，屬正式寫經。至於供養經又稱施經、願經，即信眾發願佈施的經典。」

<sup>13</sup> 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頁 167：「敦煌寫本佛經可大別為：一切經、供養經、日常用經等三大類，其中一切經乃官方寫經，屬正式寫經。至於供養經又稱施經、願經，即信眾發願佈施的經典。」

《十地經論》十二卷，《十地經論》是《華嚴經》〈十地品〉的註釋論書，<sup>14</sup>成為當時北方研究華嚴義學的核心思想，<sup>15</sup>不但北魏宣武帝非常重視並親自參與筆受，與其合作的有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皆參與其譯場筆受，崔光還撰寫《十地經論》序。在皇室宮廷的推動下，《華嚴經》與《十地經論》的研究開始興起。

菩提流支主要弘揚佛學思想中的涅槃與華嚴義學與淨土，他曾得淨土祖師曇鸞（476—542年）傳授《觀經》之淨土法門修法。<sup>16</sup>菩提流支後來離開洛陽到了鄴城，仍繼續譯經弘法。由於他精擅涅槃與華嚴義學，<sup>17</sup>約於537年左右，傳承給傑出弟子道寵，<sup>18</sup>道寵撰有《十地經論》疏，有弟子千餘人，<sup>19</sup>他活躍於北魏、東魏及北齊，菩提流支在中國弘法二十餘年，天平年間（534-537）還在，後不知所終。<sup>20</sup>雖然史料記載菩提流支最後不知所終，但菩提流支傳承了多位傑出的地論弟子，對於鄴城佛教影響深遠。<sup>21</sup>

### 三·北朝佛教刻經的發展

前述皆為關於《華嚴經》的書寫流傳，至於《華嚴經》的刻經如何開始的？以下先從北涼與北魏的刻經來看中國佛教刻經的傳統。

#### （一）北涼石塔刻經

<sup>14</sup> 《十地經論》卷1：「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大正藏》冊26，卷1，頁123中1-5。

<sup>15</sup> 熊舒琪，隋以前漢文《華嚴經》的翻譯、著錄與流傳，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11月，vol.30，no.6，頁95-99頁98。

<sup>16</sup>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6：《大正藏》冊50，卷6，頁470中23-下4。

<sup>17</sup> 馬忠理：《鄴都近邑北齊佛教刻經初探》，載中國書法家協會山東分會、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編：《北朝摩崖刻經研究》，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1年，頁153-190。

<sup>18</sup> 楊維中，〈地論師南北二道之形成新論〉，《河北學刊》，vol.36，no.1，2016 Jan. 頁25。

<sup>19</sup> 《續高僧傳》卷7：「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大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也。」《大正藏》冊50，卷7，頁482中28-下17。

<sup>20</sup> 唐·道宣《續高僧傳》《大正藏》冊50，卷1，頁428上22-429下5。

<sup>21</sup> 馮煥珍，〈六世紀華嚴學傳承考辨〉，《世界宗教研究》，頁48。

佛教經典傳譯入中國以後，主要是譯寫與抄寫複本流通，於五胡十六國的北涼時期（397—439年）始見將佛經鑄刻於石塔上，也就是北涼石塔刻經。二十世紀考古出土十四座北涼石塔，出土地點分別於涼州（武威）、酒泉、敦煌、吐魯番等地，年代分佈從北涼涼州到高昌時期。<sup>22</sup>這十四座石塔中，有六座石塔刻有《增壹阿含經·結禁品》，以及供養者的發願文。例如其中的〈馬德惠石塔〉、〈田弘石塔〉、〈高善穆石塔〉、〈岷州廟石塔〉與〈吐魯番宋慶石塔〉都是刻製精美的佛教石塔藝術，顯示此批北涼石塔出自工藝水準極高的工作坊。<sup>23</sup>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經過數百年佛經翻譯的歷史發展之後，在漢地出現最早的佛教刻經石塔，其書寫與鑄刻關係到寫經生與石刻工匠的合作發展，反映佛教由社會上層向普及大眾發展的一個契機。然而北涼這種鑄刻在石塔上的刻經，與北齊大規模鑄刻在摩崖與石窟的功能和目的不太相同。

## （二）北魏摩崖刻經像

到了北魏，佛經的抄寫流通更為普及，這時候另一個契機是開始出現佛教的摩崖刻經。位於山西河南交界處的河南省焦作市博愛縣青天河峽谷地，1970年代在修建丹河水庫時發現了摩崖佛像與刻經。<sup>24</sup>學者考察並證實其所刻像為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線刻觀世音像，題記有明確年代以及《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第二十四的其中數行。<sup>25</sup>北魏此摩崖刻經雖然並不大，但在某種程度反映了佛教展開摩崖刻經的契機。

## （三）北齊摩崖刻經

佛教的發展也在高僧與政治經濟的助緣下，於北齊時發展到達一波高峰，北齊諸帝多崇信佛教，特別是以文宣帝高洋。東魏武定八年（550）五月登王位，史稱：有齊宣帝，<sup>26</sup>盛弘釋典。天保初年，曾請僧稠禪師，授菩薩戒。<sup>27</sup>推動佛教嚴

<sup>22</sup>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年，頁91；另參張寶璽.2006.《北涼石塔藝術》，這些石塔分佈於敦煌五座，酒泉六座，武威一座，吐魯番二座。

<sup>23</sup>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0年，頁91。

<sup>24</sup> 現存最早的佛教摩崖刻經是發現於河南博愛青天河摩崖，年代為北魏，刻《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參薄烈廳，〈河南博愛青天河北魏摩崖造像及刻經〉，《中國書法》208，2010年，頁142-143。

<sup>25</sup> 張雪芬，〈河南博愛縣青天河峽穀新發現北魏摩崖觀世音像〉，《華夏考古》，2005年第一期，頁89-95。

<sup>26</sup>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9《釋靈裕傳》。

<sup>27</sup>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16《釋僧稠傳》。

禁殺生。<sup>28</sup>「登祚受禪，於僧稠禪師受菩薩戒，斷肉禁酒，放鷹除網，又斷天下屠，年三月六日，勸民齋戒，公私葷辛除滅之，度人八千」。<sup>29</sup>

北齊諸帝均十分推崇《華嚴經》，文宣帝曾親書《華嚴齋記》，立華嚴齋會，行華嚴懺法。<sup>30</sup>齊武成帝曾降詔邀請慧藏，於太極殿開闡《華嚴》。<sup>31</sup>北齊諸帝與皇室貴戚，紛紛積極大作功德，興建石窟、佛寺。如文宣帝開鑿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此外還營造雲門寺、大莊嚴寺、定國寺、興聖寺、總持寺等諸多官寺。根據《續高僧傳》卷 10：「(釋靖嵩)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sup>32</sup>

佛教發展至北齊如此興盛，規模宏大的摩崖刻經也始見於北齊(550-577年)，鄴城周邊地區的石窟開始出現刊刻佛經，以及摩崖刻經。其分佈地點包括河北、<sup>33</sup>山東<sup>34</sup>、河南<sup>35</sup>與山西<sup>36</sup>。<sup>37</sup>(圖 1)

北齊興起的鑄刻佛經活動僅以鄴城周邊地區所見為例，有幾處是鑄刻佛經于石窟壁面以及山壁摩崖。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首見如此大規模的刻經活動，由於規模甚大，須賴完備寫經團隊與刻經組織來參與才有可能做到的。

<sup>28</sup> 《釋氏稽古略》卷 2：「北齊詔僧稠禪師至京齊王洋郊迎扶接入內，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齊主拜受禪道，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佃漁。又勅天下，三月六日民間斷屠殺，勸令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留師禁中四十餘日，勅於鄴城建雲門寺以居師，兼為石窟大寺主。洋專務禪學，勅諸州別置禪肆，令達定慧者居之，就傳教授，大起塔寺，僧尼滿於諸州，佛法東流此焉盛矣(僧史)」。《大正藏》冊 49，卷 2，頁 801 下 8-16。

<sup>29</sup> 唐·道宣，《釋迦方志》卷 2：《大正藏》冊 51，卷 2，頁 974 下 6-7。

<sup>30</sup> 《華嚴經傳記》卷 5：「華嚴齋記一卷，右竟陵文宣王撰自齊梁已來，每多方廣齋集，皆依此修行也。今益州宏法師，亦以華嚴為志，勸其士俗，清信等或五十人或六十人，同為福祉。人各誦華嚴一卷，以同經部，每十五日，一家設齋，嚴道場高座，供主昇座，餘徒復位，各誦其經畢而方散，斯亦齋集之流也。」《大正藏》冊 51，卷 5，頁 172 上 23-中 17。

<sup>31</sup>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6 《釋僧稠傳》。

<sup>32</sup>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 10：《大正藏》冊 50，卷 10，頁 501 中 12-16。

<sup>33</sup> 根據劉濤所考察北朝末年的摩崖刻經書法，河北地區有：1.《鼓山刻經》(邯鄲，568—572年)；2.《滏山刻經》(邯鄲，565年)；3.《中皇山刻經》(涉縣)；4.《木井寺刻經碑》(涉縣，571—573年)。

<sup>34</sup> 山東地區是摩崖刻經最多的，包括有：《泰山經石峪刻經》(泰安)；《徂徠山刻經》(新泰，570年)；《水牛山刻經》(汶上縣)；《二洪頂刻經》(平陰縣)；《峰山刻經》(鄒縣，凡兩處)；《尖山刻經》(鄒縣，575年)；《鐵山刻經》(鄒縣，579年)；《葛山刻經》(鄒縣，580年)；《岡山刻經》(鄒縣，580年)。

<sup>35</sup> 河南有安陽寶山靈泉寺刻經(563年)。

<sup>36</sup> 山西地區有太原《風峪刻經》(550—559年)。

<sup>37</sup> 劉濤，〈北朝末年的摩崖刻經書法〉，這 15 處刻經，除《木井寺刻經碑》外，基本上是摩崖刻；所刻內容，以佛經為主體內容，還有佛號、經主題名、書寫者題名、年款等項。但是，自清朝金石家、書法家訪求北朝刻經遺跡的著錄及拓本所見，這五項俱全者僅《尖山刻經》。而各處所刻的佛經，不管是整部還是部分章節，多是當時比較流行而且習見的《華嚴經》、《文殊般若經》、《無量義經》、《無量壽經》、《金剛經》、《大集經》、《維摩詰經》、《彌勒成佛經》、《勝鬘經》、《涅槃略說戒經》等。



(圖 1) 北齊地域圖<sup>38</sup>

<sup>38</sup> 圖片來源：<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gv/cmeps/1984/cnws33-2.htm>

在進行大規模刻經之前，必定已得抄寫之複本佛經。承前述，敦煌寫卷題記有北魏馮熙以自身家財來造十六部一切經，到了北齊（550年—577年）官方也開始抄寫三部一切經，根據《廣弘明集》卷22魏收所撰〈北齊造三部一切經〉的願文：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於有待，驅眾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sup>39</sup>

魏收所言「刻檀作續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意味著當時在許多地方繪造佛像，鐫刻石經的活動，北齊國祚並不長，但在短短數十年之內其統治領域相關範圍內所出現這大量的佛教刻經，應為一統一規劃執行的機構在管理與生產這些典籍，根據史料記載，北齊開始設立「典書坊」。<sup>40</sup>或許這就是為何現今可於當時北齊國都境內，例如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均出現這些石窟或摩崖刻經的原因。

另外《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一記載：

「北齊佛經石刻，尤為古今大觀。因山摩崖，鑿龕建柱。山東泰山《金剛經》、徂徠山《大般若經》……皆始自北齊。太行左右，蓋有未發現者。若《太平寰宇記》言，遼山縣屋駮嶺，《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鐫山腹寫一切經，當亦尚存。此書所述涉縣摩崖，近人審為北齊，已傳拓者九石」<sup>41</sup>

根據馬忠理考證此段文獻記載，認為這是北齊在涉縣中皇山的石窟山崖鐫刻佛經，前文所提之「《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鐫山腹寫一切經，當亦尚存。」或許正是北齊刻寫一切經的國家計劃。<sup>42</sup>文獻上所記載北齊鐫刻一切經的實物遺存，

<sup>39</sup>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22。《大正藏》冊52，卷22，頁257上19-29。

<sup>40</sup> 唐·魏徵《隋書》卷27，志第二百百官中：「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並統伶官西涼二部、伶官清商二部。」典書坊，官署名，北齊始置。為東宮二坊之一。設庶子四人、舍人二十八人，又領典經坊（有洗馬八人）及守舍人、門大夫、坊門大夫等，並統伶官。隋沿置，設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等官。並領內廄（有尉，掌內車輿等事）。典經坊歸門下坊，改稱司經局；門大夫等亦歸門下坊，設宮門局。唐改典書坊稱右春坊。

<sup>41</sup> 柯昌泗撰《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一。

<sup>42</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8，「…《太平寰宇記》撰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當時尚能看到《齊志》，書中《郡國志》的記載當有較高的可信度。」。

可以印證二十世紀在北齊當年的領域範圍內考古所發現許多石窟鑄刻有佛經，例如山東地區摩崖刻經、河北涉縣、河南安陽等地區的石窟刻經。若暫不論山東摩崖刻經，關於北齊鄴城地區的佛教石窟與刻經，<sup>43</sup>根據李裕群的考察，包括有南北響堂山、小南海石窟、八會寺、香泉寺、大住聖窟、媧皇宮等石窟，在其所撰《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一文所附表「鄴城石窟刻經一覽表」，其中所列鄴城地區各石窟鑄刻的經典包括三國吳支謙、西晉竺法護、北涼曇無讖、前秦鳩摩羅什、南朝蕭齊曇摩伽陀耶舍、南朝宋求那跋陀羅、南朝宋曇良耶舍、北魏菩提流支、北齊那連提黎耶舍、南朝齊曇景等譯場所翻譯出之佛經，由此可以約略推測當時鑄刻佛經的計劃是收集出自南北各不同譯經法師譯場之佛經。

### 1. 響堂山刻經

北齊鄴城與晉陽兩都之間的交通，即往來於今太行山八陘的滏口陘，是自古以來的軍事要道，北齊於此沿途修建佛寺石窟與皇家離宮。山路沿途多個石窟均有刊刻經文在石窟和摩崖之上，現存響堂山石窟包括的範圍有南響堂山、北響堂山石窟、水峪寺石窟等。

北響堂惟有南洞有北齊刻經，根據現存於窟外的《唐邕寫經碑》記載，刻於窟外拱門左右兩側及北側的《維摩詰經》、《勝鬘經》、《孝經》和《彌勒成佛經》四部經，均為唐邕所刻。洞內前壁的《無量義經·德行品》和位於該洞其它地方的經名、佛名號等不知何人所刻，但這些只有千餘字。

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景區現存大小石窟 7 座，分上下兩層，上層 5 座，下層 2 座為中心柱窟，其中第 2、4、5、6 窟為一組整體建造的洞窟，並且比其他洞窟的年代早。下層的第一與上層第三窟為一組洞窟，第 7 窟在二層石窟的偏北處，修建的時間稍晚，很可能建於（581-618）隋代。<sup>44</sup>自下而上分別為華嚴洞、般若洞、空洞、阿彌陀洞、釋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圖 2）（圖 2a, b, c, d, e）南響堂山石窟下層第一窟華嚴洞規模最大，上層千佛洞最精美。華嚴洞高約 4.9 米，寬和深各約 6.3 米，內刻《大方廣佛華嚴經》，故稱華嚴洞。<sup>45</sup>（圖 3）華嚴洞是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正面主龕佛像之佛頭已殘，二旁之菩薩僅存四尊軀幹。中心柱主佛龕的上部有浮雕《佛會圖》（圖 4）和洞窟入口上方有《西方淨土圖》。（圖 5）窟內右壁與前壁鑄刻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圖六）年代約於北齊 568 至 572 年間，書體為隸書。刻經牆面長 1005 厘米，寬 220

<sup>43</sup> 李裕群，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頁 451-452，附表「鄴城石窟刻經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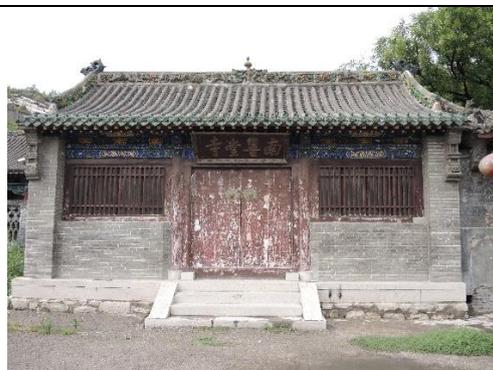
<sup>44</sup> 參響堂山項目：<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sup>45</sup> 張林堂，《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錄》（一）（二）其中第一冊頁 1-12 有詳細華嚴經刻經錄文，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https://kknews.cc/culture/zk5yxg.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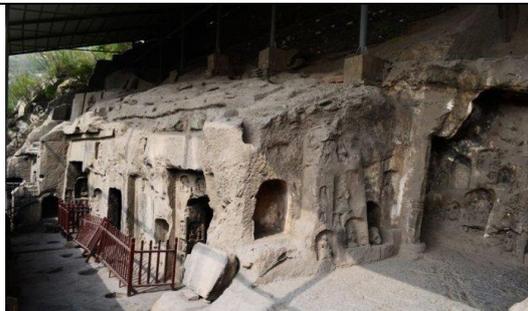
厘米。包括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諦品，《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光明覺品第五；《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第六與淨行品第七。<sup>46</sup>



(圖 2)南響堂石窟地處臨水鎮紙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陽河北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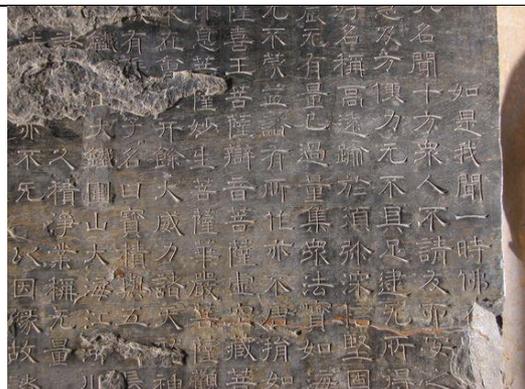
(圖 2a)南響堂石窟寺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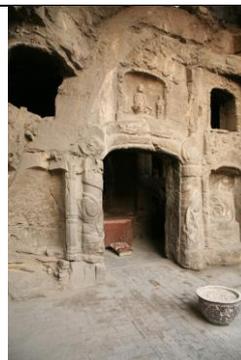
(圖 2b)南響堂石窟景區現存大小石窟 7 座，分上下兩層。<sup>47</sup>



(圖 2c)南響堂石窟下層之石窟



(圖 2d)南響堂石窟南洞前廊維摩詰經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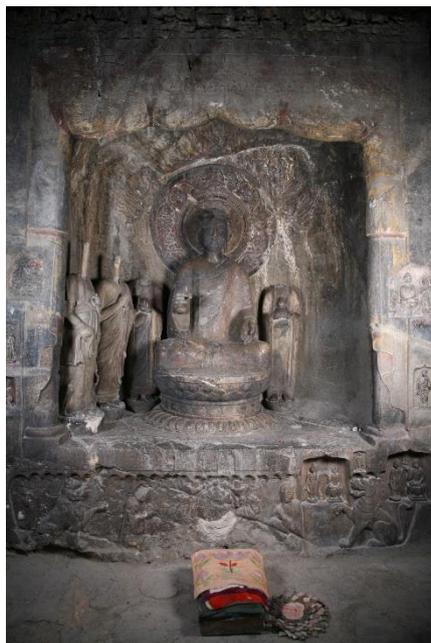


(圖 2e)南響堂石窟下層之華嚴洞外觀<sup>48</sup>

<sup>46</sup> 于亞龍，《響堂山北齊石刻經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sup>47</sup> 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999b260102vv6o.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999b260102vv6o.html)

<sup>48</sup> 圖片來源：響堂山項目 <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圖 3) 南響堂山石窟下層第一窟華嚴洞之中心塔柱主龕



(圖 4. 南響堂第一窟華嚴洞中心柱主佛龕上部，佛會圖像，北齊)<sup>49</sup>

<sup>49</sup> 圖片來源：響堂山項目 <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2017 年 8 月 15 日)



(圖 5. 南響堂第一窟華嚴洞前壁上層，西方淨土浮雕)



(圖 6. 南響堂山石窟下層第一窟華嚴洞右(東南)壁佛龕和《華嚴經》刻經)<sup>50</sup>

<sup>50</sup> 圖片來源：響堂山項目 <https://xts.uchicago.edu/zh-hans/content/%E5%8D%97%E5%93%8D%E5>

## 2.中皇山刻經

位於河北涉縣的中皇山，又名唐王山，刻經群位於緊靠山腰媧皇宮。(圖 7) 原有三石窟和四壁摩崖，三石窟即南、北、中三洞窟，南洞被始修媧皇閣時所毀。故現存的刻經分佈於北、中洞的六壁及洞外的四壁上，洞內刻經保存完好，是我國現存摩崖刻經字數最多的地方。根據清嘉慶四年的《涉縣誌》記載：「唐王山……一名唐王。後唐莊宗伐梁過此，因名。山下舊有北齊時離宮，傳載文宣帝高洋，自鄴詣晉陽，往來山下，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腰見數百僧行過，遂開三石窟，刻諸尊像，及天保末，又使人往竹林寺取經函，勒之岩壁，今山上經像現存。」<sup>51</sup> 中皇山刻經 13 萬餘字的五部經文，應是以駱駝載運往山腰間刻經現場的。《齊志》是北齊王劭所撰，可以印證《涉縣誌》關於唐王山傳載的可靠性。<sup>52</sup>

中皇山所鑄刻的佛經共有六部大乘經典：一、《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sup>53</sup>二、《十地經論》，三、《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四、《佛說孟蘭盆經》，五、《深密解脫經》，六、《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共計 13 萬餘字，是保存字數最多的一處刻經。<sup>54</sup> (圖 8) 其中梳妝樓背面之整面崖壁之《思益梵天所問經》，是至為壯觀的摩崖刻經。(圖 9) 中皇山如此龐大的刻經工程中，尤以《十地經論》佔了最多的字數，<sup>55</sup> 共計有 58,400 字，也是現存唯一的完整《十地經論》刻經。此經從中皇山的第二號刻經石室(又稱眼光洞)，此洞三面刻滿經文《十地經》一品後半部及二至七品經文，共 256 行，兩萬八千五百餘字。(圖 10, 11) 另又於第三號刻經石室(又稱蠶姑洞)繼續刻經，銜接二號石室繼續刊刻《十地經》的第七品後半部分及八至十品經文，《十地經》於此洞整部經文全部刻完。<sup>56</sup> 《十地經論》在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與佛陀扇多于 508 年合作共同譯出後首見完整鑄刻於此，也是全國現存唯一一處《十地經》刻經。其次為《深密解脫經》刻有 32000 字，至為珍貴。

%A0%82%E5%B1%B1%C2%A0%C2%A0%E7%AC%AC-1-%E7%AA%9F

<sup>51</sup> 清·戚學標，《涉縣誌》，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年。

<sup>52</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8-9。

<sup>53</sup> 鳩摩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大正藏》冊 15，頁 33 上 2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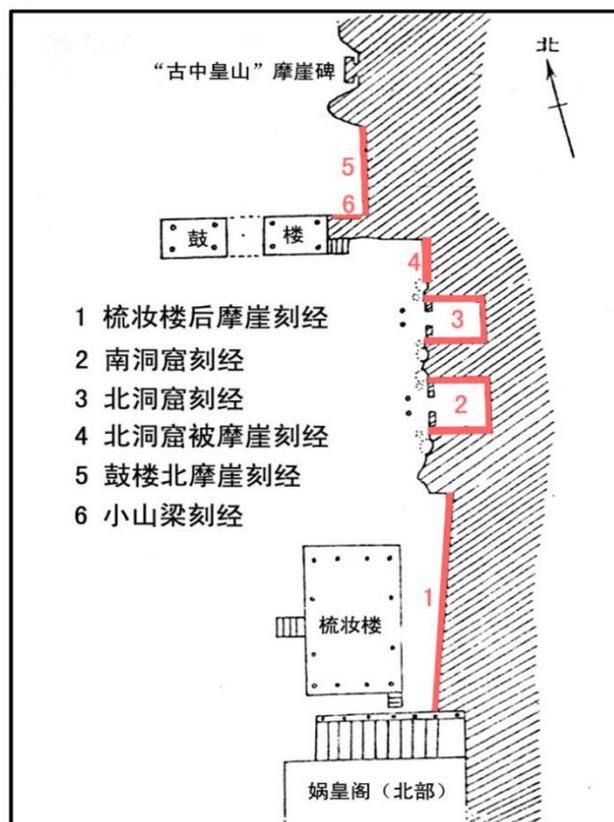
<sup>54</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15。

<sup>55</sup> 根據劉元堂文末附表一，《思益梵天所問經》刻有 36900 字，《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與 2,480 字，《佛說孟蘭盆經》為西晉竺法護譯本，刻有 806 字；《深密解脫經》為菩提流支所譯，刻有 32,000 字；此外還有《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為鳩摩羅什譯本，刻有 958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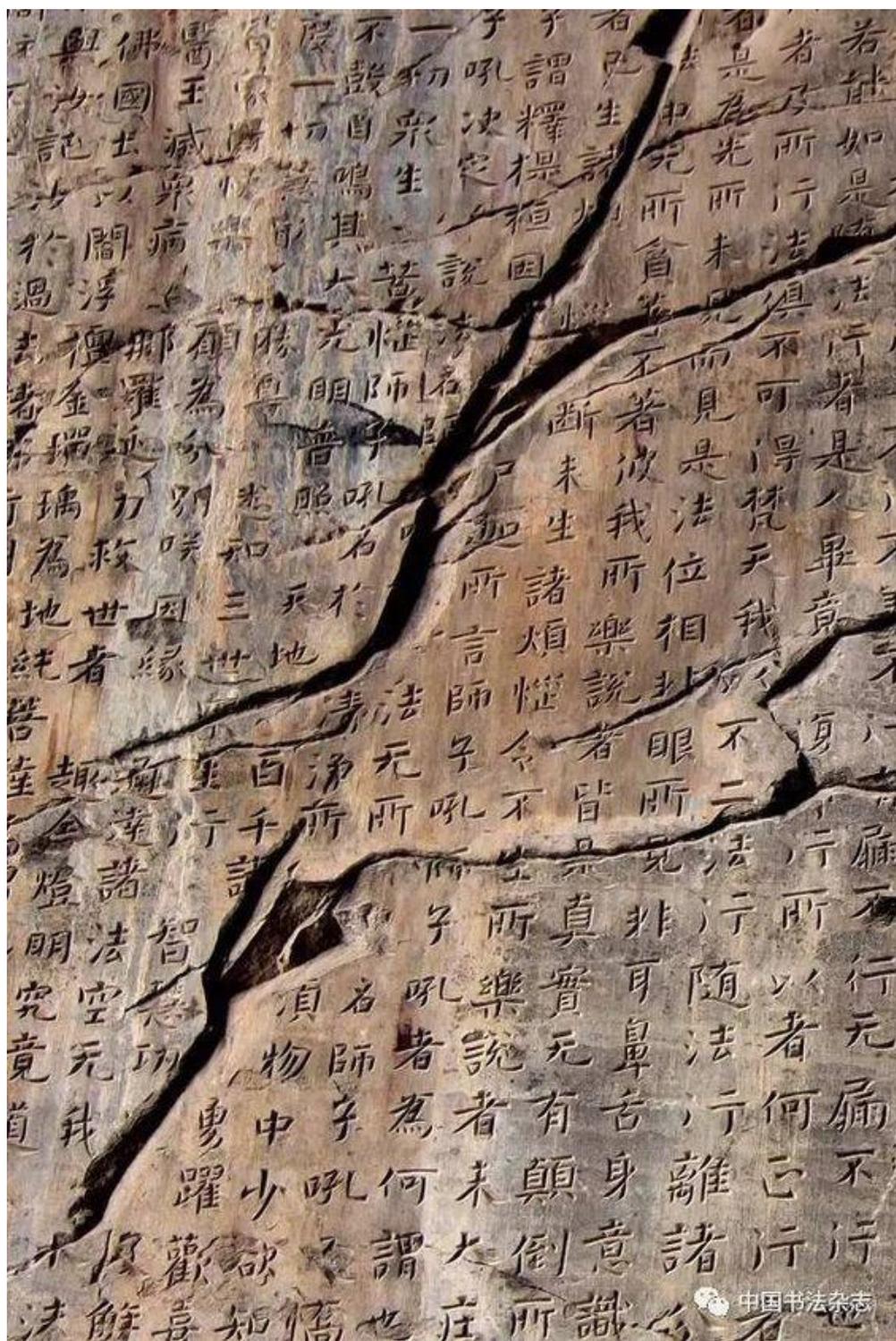
<sup>56</sup> 牛永芳，〈涉縣中皇山摩崖刻經〉，《中國書法·書學》(<https://read01.com/Rjmxkk.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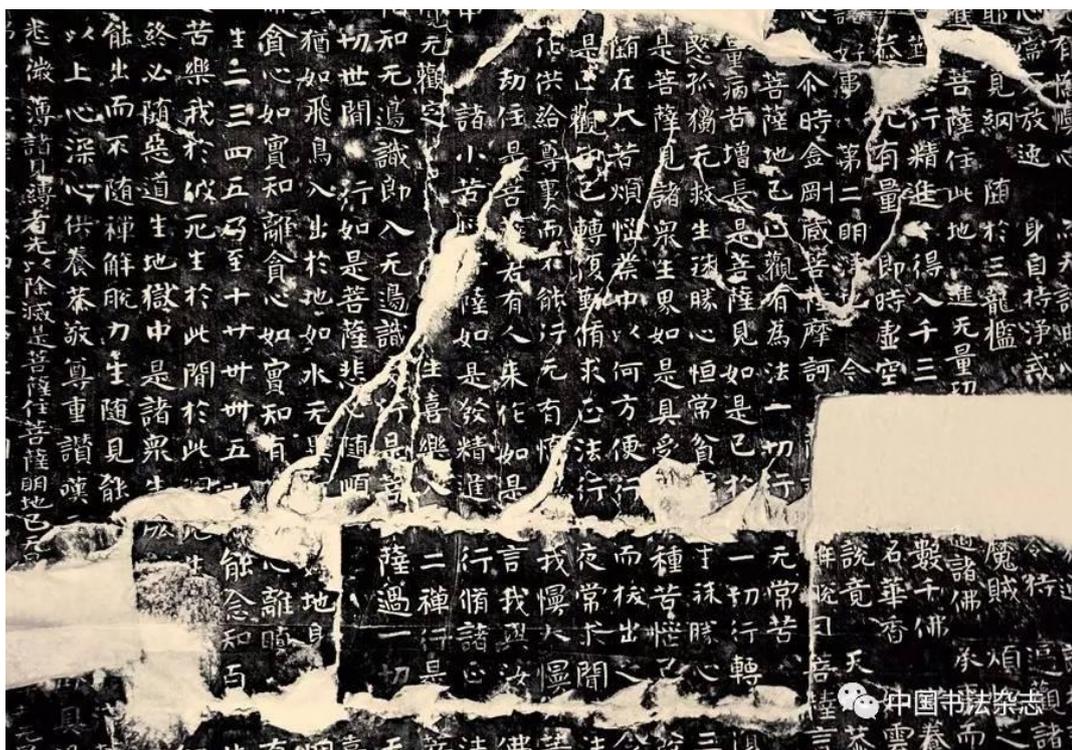
(圖 7. 河北涉縣中皇山摩崖與位與山崖之媧皇宮，地勢險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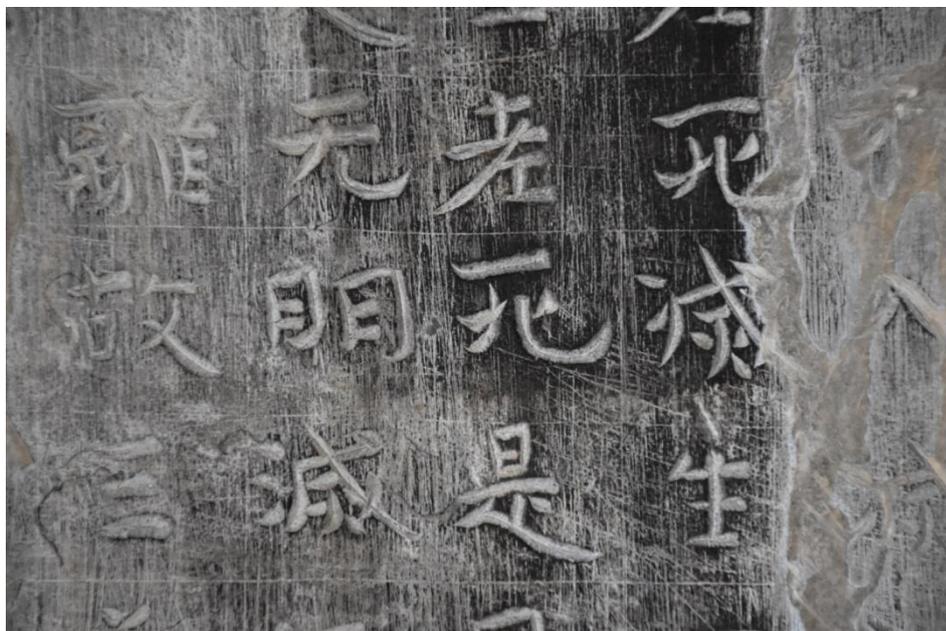
(圖 8. 中皇山摩崖與石窟刻經分佈圖)



(圖 9. 涉縣中皇山梳妝樓背面之摩崖刻經《思益梵天所問經》)



(圖 10. 中皇山二號刻經石室(眼光洞)刻經拓片《深密解脫經》)



(圖 11. 中皇山二號刻經石室(眼光洞)刻經拓片《深密解脫經》局部)

另外在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也是北齊時期重要石窟寺院，是地論師道憑法師於東魏武定四年（546年）創建。靈泉寺至今保存珍貴的文物之一有二通北齊刻經碑《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和《華嚴八會碑》。（圖 12，12a）石碑于清嘉慶四年 1799 年前重新出土，當時「字畫無損滅」。經李裕群研究，考證《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是北齊婁睿於河清年間（約 563-564 年）結識僧人靈裕，為寶山寺施主，並尊奉靈裕為戒師，靈裕法師深研並弘揚華嚴經，曾於北齊天保十年（559 年）撰有《華嚴經文義記》。<sup>57</sup>由於地論宗慧光法師為昭玄大統，主要弘揚《十地經論》，此論為華嚴經的核心思想，慧光法師之後有弟子法上繼任昭玄大統，而靈裕是法上弟子，所以《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也是證明靈泉寺與華嚴經思想有密切關係的證據。

（圖 12.安陽寶山靈泉寺北齊刻經碑《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和《華嚴八會碑》）	（圖 12a.安陽寶山靈泉寺北齊刻經碑《司徒公婁睿華嚴經碑》和《華嚴八會碑》） <sup>58</sup>
	

### 3.中皇山刻經書法風格反映之南北交流

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共有六部，主要鐫刻的書法風格有隸書與楷書，大多為楷書，<sup>59</sup>楷書風格結字獨特，筆畫豐腴而雅逸，頗有禪門飄逸之美。僅有《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前 121 行為隸書。其書法雖然以楷書為主，但同中有異，如此規模的刻經活動，顯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完成。學者推測擔任書寫的寫手至少有八、九位。刻經總計 13 萬餘字，此浩大的刻經工程，並沒有明確的石刻題

<sup>57</sup> 李裕群，〈靈泉寺北齊婁睿《華嚴經碑》研究〉，《考古學報》，2012 年第一期，頁 72-73。

<sup>58</sup> 圖片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795b00101icos.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2795b00101icos.html)

<sup>59</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調查〉，頁 23。

記題名與紀年，所以研判經主可能為唐邕或齊宣帝高洋，李裕群先生在《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sup>60</sup>認為中皇山刻經為唐邕所主持刊刻；劉元堂考證認為以齊宣帝高洋較為可信。<sup>61</sup>至於刻經的年代，通常認為刻寫十數萬字的經文，並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完成的事情，結合經主為高洋的判斷，中皇山刻經可能始自天保末年。

中皇山刻經以往由於傳拓不易，鮮為人知，但近幾十年來，由於考古與學術界對於鄴城地區的研究屢見新成果，中皇山的研究也有數部專論，而對於其書法風格分析較為精闢者為劉元堂的碩士論文與幾篇專論，文中他注意到中皇山刻經的楷書風格中有部份與敦煌寫本 P.2965《佛說生經第一》書法類似：<sup>62</sup>

「……在敦煌寫卷中也找到了與中皇山刻經楷書寫法或風格相似的經卷，如北 004 號（陽 4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菩薩明難品》〈淨行品第七〉、<sup>63</sup>S.315《優婆塞戒》、津藝 022《大般涅槃經卷第四》、P.2965《佛說生經第一》和敦研 019、020《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等，它們又分別與中皇山刻經楷書的各種書法風格類型互為接近。……」<sup>64</sup>

針對中皇山的刻經書法，劉元堂將 P.2965《佛說生經第一》與中皇山刻經書法比對，可清楚看出中皇山刻經書法風格深受南方書系影響，尤其是智永所寫的《千字文》書法，智永和尚生卒年不詳，是王羲之的七世孫。生活於南朝陳（557—589 年）至隋朝年間（581—618 年），他曾經寫了八百多本的《千字文》流通，其書法成為隋唐學書者無不臨習之範本。（圖 13）法藏敦煌寫卷 P.2965《佛說生經第一》是西晉竺法護翻譯的，而敦煌寫卷有南朝陳太建八年（576 年）的卷尾題記記載：

<sup>60</sup> 李裕群，〈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考古學報》，1997 年第 4 期，頁 474。民國時人范壽銘《循園金石跋尾》稱：「乙未春間，顧君鼎梅遣石工孫泰安赴涉椎拓整幅，於洞口得殘造像一方，文曰：「亡女趙妃，志趣貞石，德口內融，春秋未幾，奄頽蘭馥。聞者悲悼，聲言頓絕，況曰母子焉。堪忍痛今，因令王建福之次，遂竭家資，敬造觀世音像、觀世音經。刊山鑿石，題文不朽。唯願亡女口斯織屬，入彼華堂云云。」下段暨左方即刻觀世音經，其字體亦與三洞佛經無異。考北齊唐邕傳載武平初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造像內所稱「令王建福之次」，即指唐邕而言，其言亡女趙妃，當即唐邕之妻，而造像者趙妃之母也。邕遷尚書令，封晉昌王，在武平之初，則此三洞佛經為天統間刻無疑。證以舊說，謂「天保末，使人往竹林寺取經函，勒之岩壁」時代亦合似。」

<sup>61</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調查〉，頁 24，（附表一，中皇山刻經一覽表）。

<sup>62</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12。

<sup>63</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6 菩薩明難品〉：「大方廣佛華嚴經菩薩明難品第六」《大正藏》冊 09，卷 5，頁 427 上 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 淨行品〉：「淨行品第七」。《大正藏》冊 09，卷 6，頁 430 上 22。

<sup>64</sup> 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書法研究〉，頁 15。

「佛說生經第一，陳太建八年歲次丙申、白馬寺禪房沙門慧湛敬造經藏。普被含生同仏性者，開甘露門、示解脫道。願乘此善、乃至菩提。裂生死網、破無明藪。智慧神力、次第開發，入法流水、成等正覺。回奉十方六道、為無所得故。」(圖 14, 15)

觀察中皇山的刻經，例如《十地經論》與《深密解脫經》，<sup>65</sup>其書法風格皆與《佛說生經》的南朝書寫風格類似，白馬寺沙門慧湛或許是受到了智永和尚時代風格的影響。<sup>66</sup> (圖 16)

關於北齊佛教藝術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多處考古發掘出土的精美絕倫的佛教造像，為我們展示了典型的北齊佛教藝術「鄴城模式」。例如山東青州造像，以及河北鄴城考古出土的大量造像。而所謂的「鄴城模式」，學者研判它不但具有時代的本土特點，也吸收了印度笈多時期的佛教藝術影響。在本土風格方面，北齊鄴城還融匯了南方佛教藝術的特色，這一點是北齊佛教藝術迥異於前朝的原因。若從其佛教刻經書法來觀察，也具有這特點。據考證，在北齊之前，東魏於西元 534 至 547 年間有數次與南朝梁遣使，於北響堂山石窟可見有南朝梁的文化藝術風格影響；<sup>67</sup>北齊也曾多次遣使南方與南朝官方交流，北齊與南朝梁於 550 至 554 年之間的互相派遣使者；另外，北齊與南朝陳之間在 557 至 571 年之間也多次互相派遣使者，<sup>68</sup>或許這也就是南朝風格的書法寫經會在中皇山出現的原因。根據學者對於鄴城附近石窟與刻經已做的研究，<sup>69</sup>包括響堂山與中皇山石窟等，其中多處也鐫刻有涅槃與華嚴經，<sup>70</sup>說明當時鄴城佛教思想與修行的重點。

#### 四·結語

晉譯本《華嚴經》在南方譯出以後，其由南向北的流傳有著明顯的地理軌跡，大致上可以從建康—荊州—洛陽—鄴城看出其向北方傳布的路線。南北朝時期之洛陽與鄴城是當時二大主要佛經翻譯與佛教中心，北魏於 534 年分裂為東西魏，隨著元魏洛陽政權的解體，其佛教中心也由洛陽轉移到鄴城。北齊時北方鄴城佛

<sup>65</sup> 馬忠理，〈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頁 68。

<sup>66</sup> 王菡薇，〈敦煌陳寫本《佛說生經》殘卷新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 年 7 月，no.4，頁 37-40。

<sup>67</sup> 岡田健，〈北齊樣式の成立とその特質〉，頁 31-48，頁 41。

<sup>68</sup> 岡田健，〈北齊樣式の成立とその特質〉，頁 31-48，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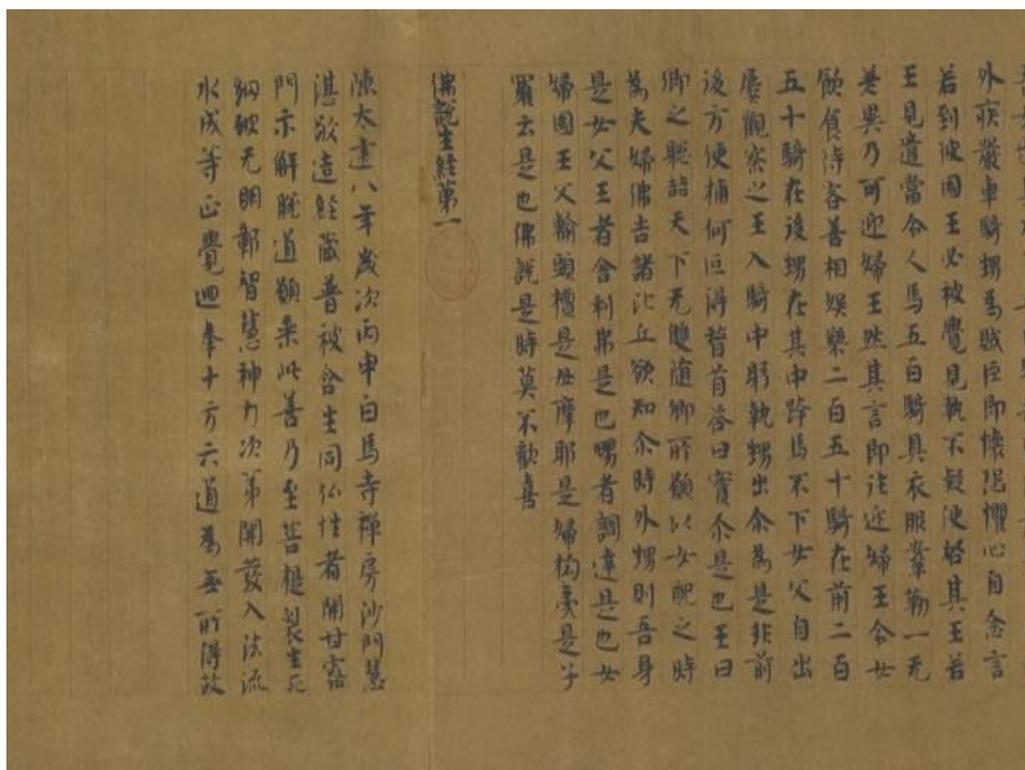
<sup>69</sup> 李裕群，〈鄴城地區石窟與刻經〉，《考古學報》，1997 年第 4 期，頁 474。

<sup>70</sup> 賴非，〈北朝佛教摩崖刻經概要〉，載劉正成主編、賴非編著，《中國書法全集·北朝摩崖刻經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0 年，頁 1-19。另參賴非，〈山東北朝佛教摩崖刻經調查與研究〉，《科學出版社》，頁 264 附表【北朝-隋佛教刻經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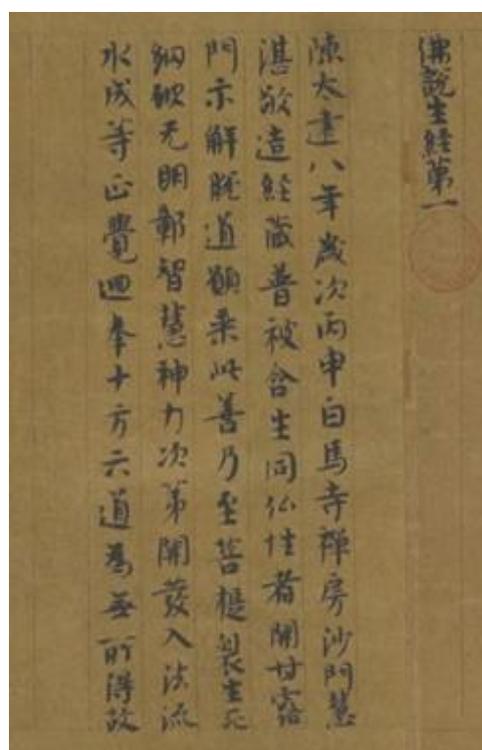
教的發展出現了另外一個高峰，其中《涅槃》、《華嚴》與《十地經》成為當時主流的佛教思想。本文考察《華嚴經》與《十地經論》等書寫流通的現象，可以得知北齊鄴城模式不但表現於佛像雕塑藝術，也同樣表現於佛教刻經，從《華嚴經》、《十地經論》與《深密解脫經》等獨特的北齊刻經書風，觀察早期華嚴系統經典由南向北流傳的路徑，也可知北齊的文化藝術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成果。



（圖 13. 智永和尚曾經寫了八百多本的《千字文》流通）



(圖 14.法藏敦煌寫卷 P.2965 《佛說生經第一》)



(圖 15.法藏敦煌寫卷 P.2965 《佛說生經第一》卷尾題記)



(圖 16. 法藏敦煌寫卷 P.2965《佛說生經第一》書法與中皇山刻經書法比較<sup>71</sup>)

<sup>71</sup> 圖片來源：劉元堂，〈中皇山北齊佛教刻經調查〉，頁 15。

